
中日关系的“进”与“退”

——基于“区分开来”原则预测的可能前景

冯昭奎

内容提要: 中国对日方针的重要思想是要一分为二看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国坚持“区分开来”原则的重大外交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日友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导致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迅速升温,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会晤开启了中日关系走向缓和的进程。当前中日关系仍面临困难,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后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是中日关系“退大于进”,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二是中日关系“进大于退”,中日关系保持缓和趋势。从中长期看,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日关系“进大于退”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

关键词: 中日关系 对日方针 “区分开来”原则 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 钓鱼岛争端

作者简介: 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874(2017)01-0001-27

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强调“中方致力于改善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两国关系现在正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①习近平对当前的中日关系用了“不进则退”四个字,实际上就暗示了中日关系的两种可能前景——“进”或者“退”。从中日关系的现状看,如果两国关系再“退”,就离爆发冲突不远了;如果两国关系要“进”,也不大可能“一路向前”。因此,关于今后中日关系发展前景,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其一是“退大于进”,其二是“进大于退”。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说“读史使人明智。”为了对今后中

^①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人民网,2016年9月5日, <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905/c64094-28692950.html> [2016-11-10]。

日关系可能出现的前景做出比较可靠的预测，需要遵循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本文拟以日本侵华战争史和战后中日关系史“为鉴”，回顾二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进与退的历史，重温中国领导人对日外交战略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区分开来”原则对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作用，并据此预测分析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两种可能前景。

一、中国对日方针与中日关系演变

关于中国对日方针，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我们不应该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日本人民也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① 这一系列讲话深刻地阐述了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日方针中一贯坚持的“区分开来”原则。

（一）对日方针中“区分开来”原则的形成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对日工作总方针总政策，是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按照抗日战争开始时就确定的“把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的指导方针，结合战后新情况而制定的。1955 年 1 月，周恩来总理指示，经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由中联部部长王稼祥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外活动的方针和计划》。1955 年 3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个文件肯定了上述对日工作总方针，提出对日政策五点基本原则：（1）反对美国在日建立军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和复活军国主义；（2）根据平等互利原则，争取改善中日关系，逐步达到外交关系正常化；（3）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中日人民友谊；（4）孤立美国，迫使日本政府改变对中国的关系；（5）间接影响和支持日本人民反美和要求独立、和平、民主的运动。^②

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③ 上述对日方针和文件是中共中央在对外战略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

^① 《习近平：不应因少数人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中国网，2014 年 12 月 14 日，http://news.china.com/zh_cn/focus/gjr/11168638/20141214/19102328_all.html [2016 - 11 - 15]。《习近平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5 年 5 月 24 日，<http://sz.people.com.cn/2015/0524/c202846-24980937.html> [2016 - 11 - 15]。

^② 转引自张香山《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日本学刊》1997 年第 5 期，第 6 页。

^③ 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载《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 498 页。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范例。之后，毛泽东围绕中日关系又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充实了中国的对日方针和战略思想。比如，1961年他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表示“要分清同日本人民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自由民主党内部有矛盾，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①

概言之，中共对日方针和文件的重要思想，就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日本，即把广大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把日本政府反华政策的决策者与可能争取和团结的政党、政治家及政府官员区分开来，把日本与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美国区分开来。这三个“区分开来”原则成为中国对日战略的锐利思想武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把日本人民和少数军国主义者区分开来”，既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依据“区分开来”原则，“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以德报怨，帮助百万日侨重返家园，把数千名日本战争遗孤抚养成人”^②，特别是对大批日本战俘进行了成功的教育和改造，他们当中很多人参加了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经济建设。^③

但是，要使“区分开来”原则为中国广大民众所接受并非易事。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残酷记忆，日本侵略军官兵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激发了中国广大民众对日本的强烈民族仇恨^④，每当中日两国矛盾激化的时候，那种认为日本人都是“日本鬼子”的仇恨情绪就会喷发出来。但是，如果听任中国民众自发的民族感情主导中国的对日政策，中日两国作为“搬不开的邻居”就可能出现“相互仇恨下去”的局面，这对两千年来以友好交往为主流的中日关系无疑是一场灾难。为此，如何运用“区分开来”原则引导广大民众正确看待战后日本，成为战后发展中日关系的重大课题。

同时，在周恩来总理的积极推动下，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日本左派和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56—457页。

② 《习近平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5年5月24日。

③ 笔者曾拜访过一位被俘日本空军教官，正是他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而他的上级林弥一郎曾率领日军飞行队帮助中国创建了东北航校，培养了包括中国空军司令员、副司令员、空军战斗英雄在内的一大批空军和民航事业的骨干。这个事实证明，即便是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普通民众也是可以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分开来”的，也是完全可以争取和团结的。

④ 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战争体验显然不同。除了1945年在冲绳与美国直接交手之外，在日本的主要国土上，日本人遭遇的是美国飞机、燃烧弹、原子弹的袭击，并没有与美军进行面对面的直接厮杀。

反战势力建立的同盟关系为基础，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方针，积极推动民间外交，克服岸信介、佐藤荣作等日本右派政府对中日关系发展的阻挠，促使两国关系在曲折中不断向前发展。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就是在民间外交的铺垫上实现的，是中国坚持“区分开来”原则的重大外交成果。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基于“区分开来”原则的重大外交成果

国家间关系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二战结束后，美苏从战时的同盟变成了对手，而美日从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敌手变成了同盟。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依然紧张，毛泽东提出了既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也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两个拳头打人”战略。1969 年中共九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①然而，进入 70 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苏联威胁的增强使毛泽东认为苏联是主要敌人^②，而长期陷入越南战争泥沼的美国政府的战略收缩使中国有可能在美苏两霸中争取美国反对苏联。尼克松指出：“越南战争是我就任总统后必须立即处理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河内，而在北京和莫斯科。”^③在中国方面，周恩来总理指示，由陈毅主持，召集叶剑英、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对国际形势变化进行了多次研讨，提出“苏修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帝大”，“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④1973 年 2 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了“一条线”构想；1974 年 1 月，他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提出了“一大片”构想，其目的是要团结“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

^① 转引自《1969 年毛泽东重新启用四老帅判断国际形势》，<http://www.maozong.com/show.aspx?id=5153&cid=66> [2016-11-20]。

^②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苏联不断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部署重兵，最多时达 100 余万人。1969 年 3 月，苏军几次对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纵深地区开炮，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打了一场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苏联还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美国设法将此情报透露给中国，提醒中国制定必要的应变措施。参见“USSR Planned Nuclear Attack on China in 1969”，<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7720461/USSR-planned-nuclear-attack-on-China-in-1969.html> [2016-11-20]。

^③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册）》，伍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年，第 448、384 页。

^④ 参见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年，第 173—204 页。

家，包括美日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势头。这意味着，中国对外战略从既反对美帝也反对苏修的“两个拳头打人”转向改善中美关系、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历来有“打老二”传统的美国也把防范共产主义威胁的矛头集中指向了苏联，与中国的“一条线”战略相呼应。

显然，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对美日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体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但是，当时中国公开的对外言论依然充满了“打倒美帝和苏修”的革命高调，即便在中美关系有所缓和甚至改善的背景下，这一情况也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中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却正是在这种革命高调中，在不被人注意的潜流下，逐渐发生着重大变化。表面强硬、实质‘务实’构成了当时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的显著特征”^①。

与中美调整关系同步，1972年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8年又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使中日关系前进了一大步。邓小平在访日期间幽默地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第二对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也就是为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的。”^②在邓小平倡导下，20世纪80—9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的中国积极学习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中日友好关系取得了巨大而务实的进步，日本还成为向中国提供贷款等政府援助最多、最有成效的国家。

（三）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有进有退

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后冷战时代。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一共同目标，日美同盟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陷入了“漂流期”。日本国内出现了质疑日美同盟还有没有必要存在下去的声音，执政长达38年的亲美的自民党下台，主流民意越来越倾向于摆脱压制日本的傲慢的美国，不愿再做对美称臣的从属国。而在美国，出现了“日本威胁论”，美国国会议员在国会大门口将日本人视为民族自豪的“日本制造”（家电产品）狠狠砸碎。与之相对，当时中日关系状况仍相当好，比如日本重量级官员只要在历史问题上“失言”，就立即遭到严厉批评甚至被迫辞职；关于历史问题表态较深刻的两个日本首相谈话也分别出现在1993年和1995年，即细川护熙谈话与村山富市谈话，

^① 宫力《毛泽东“一条线”构想的形成及战略意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5期。

^② 转引自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47页。

都坦承当年日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一心想利用日本并严防日本为中国所用的美国当然不会听任这种状态持续发展下去。通过树立敌人来纠集同盟国家是美国的一贯做法。随着 1996 年自民党再次上台，美国大力推动所谓“日美同盟再定义”，其实质就是通过寻找苏联之后的新的“共同威胁”，使一时有些疏离的日美同盟再趋紧密，并继续保持“美主日从”的基本架构。

傅高义 (Ezra Feivel Vogel) 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军失去了对手，为保住 (军事) 预算，到处寻找新的对手。仅靠强调恐怖主义威胁是保证不了足够的军费的。所以在美国的军事圈里，几乎人人都在谈论中国。我担心长此以往，美中两军的敌对会成真，那样的话美国对华思维的主流就真的会改变了。”^① 巴里·布赞 (Barry Buzan) 也认为：“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美国的) 外交政策就变得难以制定，所以美国人四处寻找罪恶和恐怖主义等等，但那些都不够引人注目。所以美国更具鹰派味道的当权者渴望着中国的崛起，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另一个明确的战略敌人，外交政策的制定又会重新变得简单。当然同时，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更加相互依存，贸易和金融对双方都非常重要，这与美国同苏联的关系是不同的。”^②

一般而言，共同威胁是同盟的生命力之所在，共同威胁越明确越强大，同盟的生命力就越强。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增强以及苏联解体后日本国内政治日趋保守化，日美两国逐步将其共同威胁由苏联置换为中国，日美同盟逐渐从“漂流期”进入“加强期”，中日关系则迅速退步，从“友好期”进入“摩擦期”。特别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 (2001—2006 年)，围绕靖国神社问题，中日出现了激烈摩擦，形成了所谓“政冷经热”的局面。

2006—2008 年，在第一届安倍晋三内阁以及其后的福田康夫内阁期间，中日领导人相继开展了“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推动两国关系明显进步。2007 年 4 月 12 日，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题为《为了友谊与合作》的演讲，他严肃地指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给中国人民心灵造成的创伤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同时他还表示：“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曾多次指出：那场侵略战争的责任，应该由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

^①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思维没有变》，中国网，2016 年 7 月 29 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6-07/29/content_38983109.htm [2016-11-30]。

^② 《专访巴里·布赞 (上) 寻求假想敌，美国鹰派渴望中国崛起》，凤凰网，<http://pit.ifeng.com/zhanluejia/special/zhanluejia05/> [2016-11-30]。

战争受害者，中国人民要同日本人民友好相处。”^① 中国领导人直面日本政府和人民，在批判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罪行的同时，明确阐述中国对日方针的“区分开来”原则，赢得日本国会全体议员的热烈掌声达十次以上。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在早稻田大学也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并签署了“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的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胡锦涛和温家宝访日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显示出，新中国成立之初制定的对日方针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所阐述的各项原则，确认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成为中日两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基石。习近平副主席在2009年12月访日时说“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将中日关系放在外交战略全局的重要位置，坚持奉行中日友好政策。我此次访问就是要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同鸠山首相达成重要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②

2009年9月上台的鸠山由纪夫首相提出了“友爱哲学”“日中友好”“东亚共同体”等外交理念，希望日本“回到立足和倚重亚洲”，并要求美军普天间基地撤出冲绳。为此，同年10月访日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怒气冲冲地指责鸠山“违背了日美军事盟约”，警告说“日本与正在崛起的中国接近将可能招致严重后果”。2009年12月，日本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率领包括140名国会议员在内、总人数达643人的第16届“长城计划”访华团访问中国，胡锦涛主席接见了访华团一行并与其进行了会谈。“半个日本国会的访华”成为当时中日诸多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中日友好关系出现了后冷战时代难得的回暖和进步。然而，鸠山首相与民主党有识之士的“亲华疏美”、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更为日本右翼所不容，也让大多数日本国民感到“跟不上”，因为大多数日本国民被美日政府虚构的“中国威胁论”所煽动，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对“威胁”自身的中国谈“友好”。这意味着，决定日本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的主要因素不在经济而在安全，中美两国谁能够为日本提供“安全”，日本就倒向谁。所谓“中国威胁论”的盛行，决定性地日本推入了美国的怀抱，也决定了鸠山内阁成为一个短命政权。2010年

① 「友情と協力のために一日本国国会における温家宝総理の演説一」、http://www.china-embassy.or.jp/jpn/zt/wenjiabaozonglifangri_jp/t311936.htm [2016-11-10]。

② 习近平 《在历史问题上，双方应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http://news.cctv.com/china/20091215/100058.shtml> [2016-11-20]。

6 月鸠山下台^①，致使鸠山内阁期间中日关系的短暂进步成了昙花一现。

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同年 9 月中日发生撞船事件。2012 年 9 月野田佳彦政府的“购岛”行为更激起了中方强烈反对，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迅速升温。2013 年 12 月安倍晋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态势，国际舆论甚至预判中日两国“即使明天开战也不奇怪”。2014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安倍首相，“习安会”扭转了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势头，开启了两国关系走向缓和的进程。2015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在雅加达应约会见安倍晋三，并于 5 月会见日本三千人访华团等。显然，中国领导人对日外交的战略思想与实践，对稳定中日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表明，中日关系一个重要特点是，领袖个人的力量显得特别巨大。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新形势下，我们要像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推动中日关系克服困难，继续向前发展。”^②

（四）中国对日外交面临新形势

为了遏制中国崛起，美国从 2010 年开始推进“回归亚洲”（后改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特别是进入 2016 年以来，位居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航运要冲的南海的领土领海争端被美国视为遏制和孤立中国的重要抓手。2016 年 5 月，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派导弹驱逐舰闯入中国 12 海里领海，公开叫嚣美军已“做好今夜与中国开战”的准备。^③“中国人视南海为‘祖宗海’，坚决维护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美国强调‘基于国际法的航行自由’”^④，甚至在南海仲裁当天宣称南海为美方“最高国家利益”^⑤。为了维护

① 石原慎太郎是把鸠山由纪夫从首相的位子上掀翻下来的第一人。早在 2010 年 4 月，日本召开“全国知事会议”，正值日本媒体大肆炒作中国海军力量的正常活动，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借机在会上质问鸠山首相“尖阁（指中国的钓鱼岛及附属岛屿）有事之际是否适用《日美安全条约》？”鸠山重申了日美早已达成的“尖阁有事之际适用《日美安全条约》”协议，但又表示“尖阁主权的归属问题还要和中国商量”。这句表态令石原大发雷霆，导致众人围攻鸠山，日本国内互联网上充斥“鸠山是卖国首相”之类的谩骂。可以说，石原此举不仅打出了倒阁（鸠山内阁）第一拳，还为日本政坛立下了一条“家规”或紧箍咒，就是日本政治家任何人都不许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其后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问题风波迭起。

② 《习近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人民网，2013 年 1 月 26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126/c1024-20331878.html> [2016-12-01]。

③ 参见《北京反击远超美国想象》，http://www.focustt.com/2016/0723/35205_6.shtml [2016-11-10]。

④ 王缉思《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常态”》，环球网，2016 年 8 月 19 日，<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6-08/9330046.html> [2016-11-20]。

⑤ 《美国在南海有什么“最高国家利益”？》，环球网，2016 年 7 月 18 日，<http://opinion.huanqiu.com/plrd/2016-07/9187871.html> [2016-11-20]。

美国海洋霸权的底线，美军频繁地派出舰机挑战中国在建岛礁的 12 海里水域，甚至将 F-35 战斗机、P-8 反潜侦察机、升级版“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等最先进武器装备派往亚太地区，使亚太地区成为美国最先进武器装备高度密集的“展示场”，还宣称将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驾驶潜水艇以及应对太空战、网络战等新技术。这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已经从以接触为主向以打压为主转变，中美矛盾已超越中国与南海声索国之间的矛盾而成为南海局势的主线。2016 年 7 月 12 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终裁决”前，美国的“里根”号、“斯坦尼斯”号两个航母群气势汹汹地闯入南海海域，中国三大舰队也在南海举行联合军事“演练”，中美在南海海域的军事对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①面对中国强有力的军事与外交斗争，8 月美国的航母群悄悄撤出了南海，中美南海博弈暂时降温。但美国并没有就此罢休，依然伙同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国，拉上菲律宾、越南等南海声索国，拽紧新加坡，笼络印度，企图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围堵。这是因为南海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②南海问题既关系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这个核心利益的底线，也触动向来被霸权国（美国也不例外）置于最优先地位的海洋霸权的底线，因而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是刚性、结构性、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绝不会“放一马”，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的南海政策可能趋于强硬，“就像冷战的时候对付苏联，60%的军力在北大西洋对付苏联……现在美国就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6 年 7 月 2 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702/c64093-28517655.html> [2016-11-30]。

^② 据统计，南海航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至少有超过 37 条世界交通航线通过该海域；每年有超过 4.1 万艘船舶、相当于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大中型商船和超级油轮要航经该海域；中国 85% 以上、日韩 90% 以上、中国台湾 98% 以上的石油进口以及美国从亚太地区进口的各种重要原料的九成以上都要经过该海域。由此可见，控制南海甚至南沙附近海域航道，就等于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上述至关重要的运输通道。南海也是大型作战平台等各种兵力兵器最有效、最重要的试验、训练和运用的场所，尤其是战略武器得天独厚的施展舞台。再者，南海拥有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以及渔业资源，其中石油储量至少 230 亿—300 亿吨，约占世界石油储量的 1/4 以上，天然气 20 万亿立方米，堪称第二个“波斯湾”。参见李杰《南海的价值，有些你还不知道》，http://www.globalview.cn/html/military/info_11486.html [2016-11-30]。

用冷战的方法对付我们”^①。美国的所作所为明确地暴露出：历来有“打老二”传统的美国现在盯上了中国，就像当年它盯上苏联一样；中美对抗有可能演变成为国际政局最突出、最危险的问题。

日本积极配合美国，蓄意炒作和插手南海问题，即使是在中美南海军事对峙暂时降温之后，日本依然利用“南海仲裁”拨弄是非，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其目的在于既帮美国守住其海洋霸权底线，又减少它在中国存在争端的东海海域的压力，再就是维护被其称之为“生命线”的、经由南海的海上运输线。

与此同时，2016 年台湾政局发生重大变化，蔡英文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一方面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一方面匆匆赶往美国朝贡，甚至表示有意向美军开放可隐匿大量军机的地下防空洞——佳山基地，其实质显然是有意加入美国军事战略体系。2016 年 7 月，美韩不顾中俄等国以及韩国民众的强烈反对，执意要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这意味着如同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威胁俄罗斯一样，美国还要在东亚部署反导系统威胁中俄等国，从而形成从西到东的美制“全球反导天网”。11 月，日本和韩国草签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补上了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中缺失的一边——日韩军事关系，企图形成以美日韩军事同盟为主的亚洲版“北约”。

总之，进入 2016 年以来，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中国外交面临新形势。对此，中国对日外交坚持“区分开来”的原则，努力争取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力量，期待日本坚持战后一路走来的和平发展道路，一再促使中日关系有所“进”。比如，2016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见安倍首相，指出“双方应该排除干扰，推动中日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11 月下旬，中日防务部门在东京举行海空联络机制第六轮专家组磋商，一致同意为早日启动运行该机制继续磋商。2016 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出现恢复倾向；中国人赴日旅游继续保持强劲势头，中国人在日本的消费占有外国人在日消费的一半以上，中国有些媒体和网站还发表了许多赴日游客谈

^① 金灿荣 《中国的每一步都会掐着美国的忍耐边界》，<http://www.chinaqing.com/sp/2016/692067.html> [2016 - 12 - 20]。

论日本之行留下良好印象的文章^①；日本产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额首次超过日本国内汽车消费总额……这些都可视为两国关系“进”的表现。

但安倍政府基于其根深蒂固的右翼政治理念，拉开了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架势：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坚持“不存在领土问题”的顽固立场；在军事上，继续煽动“中国威胁论”，渲染中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新增石油钻井平台将被用于军事目的；在宫古海峡两侧的岛屿上不断增加军力，部署用来威胁中国过往军舰的导弹；自卫队还频频派遣军舰和侦察机监视、骚扰中方的油气田作业，尾随侦察通过宫古海峡进行正常训练的中国军舰和战机。两国政治关系恶化和日媒对中国太多的负面报道，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友好感情降至复交以来最低点，以至“中日必有一战”一时成为两国民众关切的话题。总之，安倍内阁不断地与推“进”中日关系的中方努力反向而行，导致中日关系的“退”大于“进”，中日两国的对抗面日趋扩大、复杂而深刻。

二、从安全保障角度看中日关系的两种可能前景

所谓安全保障，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最坏的可能做好准备。从安全保障角度看，如本文开头所述，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两种前景，第一种前景是“退大于进”，指需要应对的若干种坏的或最坏的可能情况；第二种前景是“进大于退”。这有可能给读者造成“政策建议”的印象，但依然是一种“预测”，即对中国政府采取本文中所称“战略”或“对策”的可能性和这种“战略”或“对策”产生效果的可能性的“预测”。

（一）第一种可能前景：中日关系“退大于进”

中日关系“退大于进”，包含两种可能。

^① 王文写道“我不愿像游记那样赘述东京城市街头多干净，街道设施多便民，商业服务多可亲，厕所卫生多无味……只讲一个例子就够了。2014年中国人赴日本旅行达220万人次，比上一年增加82%；2015年更达到500万，再翻一番，这其中将近1/3的中国人都去过日本两次以上，俗称‘回头客’。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去了日本的中国游客回国后，都在讲同一个故事：日本挺好，印象不错，东西也不贵……除了经济总量的超越之外，中国对日本的社会发展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在中国GDP总量迅速超越日本的背景下，如何冷静地察觉到中国本身的不足，发现‘对手’日本的某些优点与长处，相当考验智库学者的智慧与责任。……日本其实只有中小国家的‘命’（如它的国土面积排在全球第62位，人口排在全球第11位），却曾经干出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且仍长期保持全球经济、技术靠前位置的能力。……中国人更应该拥有敬重日本人的雅量。这种敬重恐怕应与对日本扭曲历史观的憎恶、对其外交‘两面人’方式的批判并行不悖。”参见王文《有雅量发现“对手”日本的优点吗》，《环球时报》2016年4月8日。

1. 以钓鱼岛争端或日本插手南海、台海问题为导火索，中日走向全面军事对抗

与中美关系相比，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双方之间除了现实问题之外还存在着历史问题，积怨太深，互疑颇重，脆弱性和战略误判危险性很大；两国间能真正起作用的沟通渠道比中美之间少；在东海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两国之间有可能擦枪走火，甚至出现失控局面，引发大规模冲突。虽然 2014 年 11 月“习安会”以来中日关系开始了走向缓和乃至改善的进程，但右倾保守的安倍政府加强“联美制华”战略，致使当前中日关系形成两个“几无”——“几无改善的迹象”，“几无变坏的余地”。其中“几无变坏的余地”，就是指以中日关系现状来看，如果中日关系再“变坏”，那就离“战争”不远了。

当前，中日关系有可能爆发危机的冲突点有四个：其一是钓鱼岛问题。近几年来，日本步步升级在钓鱼岛海域的军事冒险行动，不断增加船只、飞机在钓鱼岛海空域巡逻，加大对钓鱼岛的管控力度，自卫队频频举行明显针对中国的夺岛演习。对此，中方当然毫不退让，也派遣更多的船只和飞机进入钓鱼岛及其周边领海领空进行常态化海空巡航。2016 年两国战机多次接近，如此发展下去，中日在钓鱼岛擦枪走火越来越成为大概率事件。

第二个有可能爆发的冲突点是南海、台海问题。2016 年 9 月，日本防务大臣稻田朋美妄言支持美国“航行自由行动”，并称将加强在南海的“行动参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表示“日方想在中方管辖海域搞什么‘联合巡航’‘联合演习’，完全是在‘玩火’，中国军队不会坐视不管”。^①可以预测，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如果胆敢派自卫队介入南海甚至台海问题，无异于引火上身。

第三个可能性较大的冲突点是朝鲜问题，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事，很可能牵连到中国和日本，引发中日冲突。此外，还需特别提及，如果美军的军机军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攻击中国，中国必将对入侵者的出发地施加反击，很可能使战火延烧至日本，成为中日冲突的另一个导火线。

总之，如果中日在钓鱼岛问题或南海、台海问题上发生冲突，将可能使 2014 年 11 月“习安会”以来中日双方为缓和双边关系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中日关系将出现新一轮恶化。

^① 《国防部：日方想在中方管辖海域搞“联合巡航”中国军队不会坐视不管》，《新京报》2016 年 9 月 29 日。

必须指出，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中日矛盾的焦点：日本的对外（特别是对华）侵略战争、战败与战后是“过去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中日钓鱼岛争端和地缘政治较量是“现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安倍“修宪”要使日本成为“能进行战争的国家”，是“将来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与中美矛盾相比，中日矛盾激化，加上百余年来累积的旧恨和新怨一并迸发出来，导致两国发生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更大，杀伤力更强。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中日之间必然会发生新的战争。平心而论，尽管在中日舆论特别是网络上充斥着“中日必有一战”的言论，但两国政府恐怕都不想看到必将对两国国家利益和民众生活造成极大伤害的武装冲突甚至局部战争的发生。另一方面，也不能说中日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为零，有三种可能导致中日之间发生战争的因素需要警惕：其一，尽管日本民众不想打仗^①，但以鼓吹“战争是人类进化的最高宗教形式”的稻田朋美为代表的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走极端、执意挑起战争的可能性不等于零。其二，中日以外的“第三方政治势力”特别是美国共和党鹰派及“军产复合体”很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挑动中日开战，以坐收渔利（包括发战争财并彻底撕裂东亚）。其三，中日双方持续备战、对峙，互不信任感越积越深，从量变到质变，可能造成两国在主观上不想发生的事态爆发。

为了防止中日军事冲突造成两败俱伤，破坏两国人民的正常生活，我们需要深入分析日本国内政治的现状，坚持“把日本政府反华政策的决策者与我们可能争取和团结的政党、政治家及政府官员区分开来”的原则，争取包括自民党、公明党及在野党在内的、能影响安倍内阁决策的“理性派”政治力量，使其认清中日发生军事对抗的极大危险性，进而敦促安倍内阁在对华政策上清醒些，敦促日本右翼在走向军事冒险主义的道路上及时刹车。与此同时，中国在大国博弈的舞台上，需防止出现某些大国想让别的大国出手与中国打一仗以便自己坐收渔利的诡谲形势。

2. 中美战略竞争升级，连带中日关系倒退，甚至形成中国与美日及美国其他盟国之间的“新冷战”局面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将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高举“美国优先”和“让美国重新强大”的旗号，发表了大量剑走偏锋的言论^②，

^① 盖洛普调查“是否愿意为国而战”，在64个国家里，日本倒数第一，为11%，中国为71%。参见《调查称日本人最不愿为国而战 超七成中国人愿意》，参考消息网，2015年3月18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50318/709411.shtml> [2016-12-20]。

^② 本文中引用的特朗普言论多引自特朗普的推特，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组建了以军人、富商及共和党右翼分子为主的政权班子，这意味着美国新政府可能更加直接地推行符合军产复合体等利益集团和右翼政治势力要求的战略和政策。特朗普的个人性格也使国际问题专家们遇到了一个奇特的课题，即需要将如何应对美国新总统的个人好恶和任性的对策置于对美政策的重要地位。2017 年，由于特朗普上任，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注定是一个充满悬念的年头，就中美关系而言将可能进入一个不确定甚至是“高危”的状态。如前所述，所谓安全保障就是对坏的、最坏的可能做好准备，面对在美国历史上最具有争议的美国新总统上台，综合各方资料对特朗普与奥巴马进行比较，从中或可预测“坏的或最坏的可能”。

首先，在经济方面，特朗普新政府很可能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发难，扬言将大幅提高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升温中美贸易摩擦。1993 年以来中国对美贸易一直是顺差，而且对美顺差占中国外贸顺差的比重很大，因此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将可能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整体造成很大冲击。

其次，在安全方面，特朗普新政府很可能采取鹰派对外政策，大幅增加军费，扩充美国军力^①，而且其主要矛头将指向中国。正如特朗普的资深安全问题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与亚历山大·格雷（Alexander Gray）撰文指出的，美国海军是“制约中国野心”、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最伟大的源泉”，“美国海军为保护每年通过南海的 5 万亿美元的商业往来做出贡献”。^②

特朗普新政府很可能进一步拉拢亚太地区诸盟国构筑围堵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并蓄意制造摩擦，挑起事端，使中国周边环境变得烽烟四起，甚至滑

① 具体指标包括：（1）潜艇。预计特朗普治下的五角大楼至少要求美国海军持续每年建造两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甚至可能达每年三艘。美国军舰总数也将从目前的 274 艘增加到 350 艘。（2）用于“突破防空”的系统。特朗普政府可能直接发展新一代“可穿透防空系统”的超级战斗机，以替代当前的 F-22 和 F-15C。（3）“下一代空中优势”。特朗普政府将发展新一代远程舰载打击和空中优势能力。（4）“定向能武器”。特朗普政府将加速奥巴马时代已开始发展的定向能武器和轨道炮。定向能武器和轨道炮很可能是打破进攻对防御的成本曲线的关键武器，因为来袭的中国弹道导弹成本约每枚 150 万美元，但一枚“标准-3”拦截弹的成本就高达 1500 万美元。对付一枚来袭导弹，美国海军至少需要发射两枚拦截弹，防御成本将高得不可承受。

② 该文还批评奥巴马政权高调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大幅削减军费（在其任期内将军费占美国 GDP 的比重从 4% 下降到 2.5%），致使“美国海军缩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小的规模，美国军队缩小到二战前以来最小的规模，美国空军也缩小到历史上最小的规模，而且使用着最老旧的飞机”，导致“亚太再平衡”战略缺乏强有力的军备支撑。该文还预计“中国海军潜艇数量已经超过美军部署在亚太地区的潜艇，预计到 2030 年，中国会拥有 100 艘潜艇和 415 艘军舰”。Peter Navarro and Alexander Gray, “Donald Trump’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Vision for the Asia - Pacific”,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7,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11/07/donald-trumps-peace-through-strength-vision-for-the-asia-pacific/>[2016-11-20].

向战争边缘……上述可能性一旦成为现实，显然有利于美国的军火商闷声发大财；有利于驱赶对投资风险高度敏感的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商业资本逃离中国而流向美国，从而成为唯利是图、主张“美国第一”（而不是“世界第一”）的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后的一桩大买卖。^①

再次，在台海问题上，作为在传统上比民主党更倾向“支持台湾”的共和党政权，特朗普新政府很可能增大和提高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数量和级别，发展美台军事交流，鼓舞“台独”势力，使台海问题升级为中美博弈的“新战场”。但这也可能变“坏事”为“好事”，因为如果美国在台湾这样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将中国逼得无路可退，反而会增强中国迅速果断地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历史和人民的庄严承诺。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② 特朗普与蔡英文通话，妄言“一个中国”政策，触碰了中国的战略底线、红线，预示着美国新政府利用台湾问题玩火的高度危险性，中国必须对此作好充分准备。

当然，上述预测主要依据特朗普尚未正式上台时的表演，这未必完全代表他正式上台之后的政策，而且即使正式就职后，由于特朗普本人与国务卿等高官没有从政经验，加之特朗普政权的合法性本身很可能受到广泛质疑^③，因此其对外政策及亚太战略的塑造估计需要半年以上的“实习期”，与中国的“磨合期”可能更长。尽管如此，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已经显示出，这是一位保守傲慢、易做过激反应、不按常理出牌的美国总统，对他当前的表演不能“不当回事”，但也不宜太当回事。由于特朗普当选严重地分裂了美国社会，加之大选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导致美国部分民众存在着强烈的反对和质疑特朗普当政的声音，预示着这届美国政府的根基不牢，或可能难以成为长期政权。

多年来，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目标就是在亚太地区构筑

^① 受到特朗普胜选的鼓舞，2016年11月以来，洛克希德·马丁、雷神、诺斯罗普·格鲁曼与通用动力等美国军工巨头的股票上涨了5%—7%，显示出“军产复合体才是美国大选真正的赢家”。“Pentagon Rising: Donald Trump Could be Good News for the Military”，<http://www.salon.com/2016/11/28/pentagon-rising-donald-trump-could-be-good-news-for-the-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partner/> [2016-11-30]。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6年11月12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6/1112/c64094-28855095.html> [2016-11-20]。

^③ 2016年12月9日，在即将离任之际奥巴马总统下令让情报部门全面调查，寻找俄罗斯黑客利用网络攻击影响总统大选结果的证据，或可能使特朗普政权的合法性发生动摇。

全面围堵中国的新冷战阵营，作为坏的或最坏的可能性，美国新政府将在实质上加强推行亚太战略的力度。我们需要准备好应对有可能比奥巴马更强硬，在贸易摩擦、军事战略、台湾问题等领域更全面压制中国的美国新政府，应对中国四周多美国的打手且多是“世界一流”对手的局面。这个可能的前景其实就是上述“中日全面军事对抗”可能前景的“放大版”，即从“东海升温”扩大到“三海（南海、台海、东海）同时升温”，中国与美日及美国的其他盟国、伙伴国之间形成全面对峙。特别是有可能升温的“台海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关系到中国军队突破“岛链封锁”的“重点战略中的重点”，中国必须作好包括军事斗争在内的全面部署和应急准备。

恩格斯说过“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获得最后胜利。”^①这句历史上的名言，前半句相当贴切地描述了当今中美在南海展开激烈博弈的最坏可能性。中国捍卫海洋权益、实现大国崛起的意志不可动摇；美国坚守海洋霸权的底线、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志也不会动摇；在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南海乃至台海的中美博弈，将可能发展成为推进中国崛起与遏制中国崛起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决战”。傅高义说“真正触动美国人的是中国军力的迅速增强。”^②但是，所谓“中国军力的迅速增强”是中国为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之必须，美国军事威慑中国的力度越大，中国军力的增强只会更加速。而后半句又相当贴切地反映了当前阻碍中美之间战争爆发的基本原因（即“（双方）军事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加之在地球环境极度恶化和核武器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保护地球生态环境乃至防止人类文明伟大成果因为冤冤相报的核大战而毁于一旦的道义制高点，又成为阻碍大规模战争甚至核战争爆发的强有力制约。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哪些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战中人们肯定用的是木棍和石块。”^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53 页。

②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思维没有变》，中国网，2016 年 7 月 29 日。

③ Albert Einstein, “In an Interview with Alfred Werner, *Liberal Judaism* 16 (April – May 1949)”, *The New Quotable Einstein by Alice Calapri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73.

再看二战后的历史事实不难发现，如果冷战变成了大国之间的热战，西方国家就会有失败的危险，朝鲜战争就是一个证明。为此，西方在冷战时期一直顾及核威慑，避免将美苏之间的冷战变成热战（核大战），最终达到了所谓“‘西方’获胜，‘东方’失败”的结局。可以预测，美国会依据这个历史经验，企图把中美在南海、台海和东海的博弈变成一场“能让美方获胜而中方失败”的新冷战。而广义“冷战”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围绕军事竞赛“相互耗”，看谁耗得过谁。美国挑起“新冷战”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期待中国像当年苏联那样陷入军备竞赛。而且，与主要是“两个霸权国之间较量”的美苏军备竞赛不同，美国欲将中国推入一场与美日及美国其他同盟国、伙伴国之间的“以寡敌众”的军备竞赛，企图极大地消耗中国的环境、经济、政治资源，从内部特别是从生态环境方面“耗垮”中国。

但是，以上所述的只是“坏的或最坏的可能”，今后中美关系也可能朝着“不坏、不很坏”的方向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双方要“通过对话协商积极寻求解决彼此间的分歧，或以建设性方式管控敏感问题，避免误解误判和矛盾升级，防止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大的干扰。中方愿同美方加强沟通，聚焦合作，增进互信，一道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① 特朗普则认为“我们渴望和平地生活，并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友谊。我们与这两个国家有严重分歧，所以必须擦亮眼睛对待他们，但我们并不一定非要成为对手。我们应该基于共同利益，求同存异。”

美国军方高官多次宣扬美中对抗，并且将之类比成当年的美苏“冷战”。然而，与当年微不足道的美苏经贸关系相比，当今美国自身及其盟国、伙伴国等几乎都与中国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经贸关系（2015年中国是美国第三大货物出口市场、第四大服务出口市场）。特朗普声称上台后要大力开展美国国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用于修缮城市，重修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机场、学校和医院（他曾多次称赞中国的建设，说“我们纽约的乔治·华盛顿大桥跟中国的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以便给数百万人带来工作；而在中国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互联互通，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今后中美很可能会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与此同时，美国在多个全球或地区性事务和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都

^① 《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人民网，2016年4月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401/c1024-28243167.html> [2016-11-20]。

需要与中国合作，作为候任总统的特朗普显示出比奥巴马更加重视中东地区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我们可能通过加强中美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弱化中美之间的尖锐对立。在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的特朗普执政期间，我们需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趋利避害，保持战略耐心，确保中美关系不至于演变成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似的全面军事对抗状态。

（二）第二种可能前景：中日关系“进大于退”

如前所述，美国一贯不愿看到中日走近，早在 1972 年就在中日之间埋下了钓鱼岛问题这颗离间中日关系的“政治地雷”，这颗“政治地雷”在 2012 年 9 月由于日本政府“购岛”激起中方强烈反对而爆发。而这次雷爆的真正“引爆者”恰恰是美国。2012 年初，中日韩关于东北亚自贸区的谈判接近成功，同年 4 月中日围绕货币互换和互相持有对方国债初步达成协议，这使美国感到十分不快，就在同月由一家“研究机构”出面，邀请本来持反美立场的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到华盛顿发表演讲，宣称“东京政府决定购买‘尖阁列岛’”，其后进一步发展成为日本政府“购岛”，使钓鱼岛问题这颗“政治地雷”离间分化中日关系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美国为了围堵崛起的中国，采取各种手段离间分化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最新例子就是利用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对发展良好的中韩关系打进楔子，使 2015 年朴槿惠总统到北京参加“9·3”大阅兵而一时达到高水平的中韩关系乃至韩国内部政治陷入深刻的危机。

在国际政治领域，各国除了可以通过加强军备、与别国结盟来增强本国权力之外，还可以通过实施“楔子战略”来分化潜在对手国家结成的反制联盟，从而提升本国相对权力。美国学者迪莫斯·克劳福德（Timothy Crawford）认为，“楔子战略”是一个国家在一种可以接受的代价下，力图阻止、破坏或弱化一个威胁性或围堵性联盟出现的战略，当这种战略取得成功时，该国（即分化者，亦即操作“楔子战略”的国家）因为减少了组织起来对付自己的对手国家的数量和力量而得到好处。“楔子战略”还可能将对手国家转变成中立国家甚至己方盟友。因此，该战略“有可能触发令人吃惊的权力转换”，其结果“会对战争与和平乃至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产生重要影响”。^①

当前，中国在应对美国竭力分化离间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以便结成反华

^① Timothy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4, 2011, p. 155.

军事围堵圈的斗争中，既采取了大力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等措施，也采取了运用硬软实力对美国多年来实施的分化战略实施有效“反分化”的政策。随着“南海仲裁案”翻篇，南海问题逐步回归双边磋商和谈判协商解决的正道，菲、马、越等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达成了诸如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分歧、加速“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等一系列新共识。特别是2016年10月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访华后，中菲关系实现转圜，而且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得到改善，中国与其他几个声索国之间的关系也转暖，这正是我们在美日与南海声索国之间实施分化战略取得成效的表现。

但美国绝不会容忍南海局势目前出现的“暂时稳定”状态持续下去，必会采取各种外交、军事手段，包括亲自加强高端武器在南海的常态化巡航和“展示”，将南海域外的同盟国（如澳大利亚）拉进南海博弈中来，甚至企图颠覆疏离美国的政权，继续破坏南海稳定，从而导致中国捍卫南海核心利益和美国“不远万里”到南海来捍卫其“最高国家利益”（海洋霸权的底线）的斗争可能变得更加复杂。加之台海问题有可能成为中美博弈的“新战场”，可以预测，在南海、东海、台海，中国将可能把维持台海、南海稳定置于最优先解决地位，“一个拳头反击”美国在南海、台海搅局的战略选择，为了防止在南方和东方“两面受‘敌’”，显然需要维持东海方向的缓和，进一步扩大分化战略的实施对象，并敦促在南海问题上动作频频的日本不要“没完没了”。

日本是美国的“铁杆同盟国”，要撬动日美关系难度很大，但并非完全不可能。日美同盟并非铁板一块，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巧妙地采取硬软两手，或者说交替地采取所谓“选择性迁就”（selectively accommodate）方法的楔子战略与“对抗”（confrontation）方式的楔子战略^①，促使日本调整近年来日益升级与中国对抗的立场和政策。当然，对硬软两手的选择和使用频度、力度，必须以对分化对象的国家实力与软肋、战略意志与决心及其跟盟国关系的“亲密”程度的准确判断为依据，如果误判这些事实，可能使中国面临更紧密

^① 美国学者格林·斯奈德（Glenn Snyder）将楔子战略区分为“选择性迁就”方法的楔子战略与“对抗”方式的楔子战略。选择性迁就战略混合使用了“胡萝卜”和“大棒”，给对立同盟的成员或潜在成员施加截然不同的压力，即选择性地包容一个对手国家（也就是目标国家），同时却对另外一个对手国家采取强硬立场。这种战略被认为比单纯依靠对抗和压制的办法更有可能分化一个对立联盟。对抗式的楔子战略是一概以强硬的方法来应对所有对手国家或潜在敌人。这一战略的基本思路是，持续不断的强硬和胁迫将暴露并加剧对手国家战略利益的裂痕，削弱它们之间合作的能力，并促成反叛行为的发生。

更强大的对立性同盟的挑战。

需要强调的是，安倍当政期间，我们争取日本的目标不宜定得过高，所谓争取日本“全面支持”中国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争取日本的目标宜定得“适度”，即软硬兼施地敦促安倍政府继续维护 2014 年 11 月以来两国关系的缓和进程，加强中日在环境、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乃至“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贸合作，在此基础上再争取日本同中国进一步缓和甚至改善关系。近年来俄日首脑频频会晤，2016 年 12 月中旬普京访日推动俄日外交破局，或可能对中日关系调整产生影响并蕴含启示。总之，如果中日关系继续延伸 2014 年 11 月开启的缓和进程，就可能避免中国在南海、台海和东海“三海联动”“两个拳头反击”。这样做也符合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将解决作为“核心中的核心”的台海问题置于突出重要地位，防止“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以奏效”的战略思想。^①

综上，作为一种预测，我们或可能进一步实施软硬兼施的“楔子战略”以破解美国的对华围堵战略，削弱日美同盟指向中国的矛头。为此，需要坚持中国对日方针的三个“区分开来”原则，特别是其中“把日本与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的美国区分开来”的原则，抓住日美两国在地理位置、优先战略、相对国力、主流民意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加以区分和区别对待。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实际上，中国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就来自美国一个国家。（除美国外）任何一个国家都威胁不了中国，这些小国只是想利用美国向中国多争取一些利益。”^②这个观点可以充实“区分开来”原则，即我们可以将唯一能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企图利用美国向中国多争取一些利益的国家区分开来并区别对待，以利于减少组织起来对付中国的对手国家的数量和力量。

历史不会重复，但常常会有相似之处。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曾经从“两个拳头打人”战略向集中反对主要对手苏修的战略转变，既改善了中日关系也改善了中美关系。那么，当今我们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将美国与其铁杆同盟国日本区分开来，区别对待？能否既改善与包括南海声索国在内的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又促使至今仍在不断给我们找麻烦的日本继续与中国

^① 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② 郑永年《中国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就来自美国一个国家》，<http://observe.chinaiss.com/html/20165/23/a83336.html> [2016-11-30]。

缓和关系？特别是对日本，能否进行分化与争取？应该说可能性是存在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如上所述，美国是唯一能够真正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国家。从中日国力对比来看，日本显然在战略上威胁不了中国，它主要是想利用美国多争取一些安全、外交与政治利益，这是日美两国的最大区别。虽然日本在东海上发起了局部性战术攻势，但其对华战略总体是旨在防范中国不断增强的海空军事力量，属于守势。^① 虽然日本自卫队海空力量可以与中国“有一拼”，但中国的海空军+火箭军的总力量已经远远强于自卫队，一味同中国对抗的安倍政府必须明白一点：日本可能从美国那里乞求的“安全保障”会越来越不牢靠，尤其是特朗普已经要求日本等盟国承担更多安全成本，为美国所“透支”的军事保护“付费”，因此“日中一旦有事”，“美国的支援不是东京可以像使唤保安一样随便打个电话就能支配的。美日同盟不是日本可以随意挑衅中国而不负任何代价的保险单”。^② 反倒是中国需要软硬兼施地让安倍政府认识到：日本能否确保其“安全保障”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国，东北亚安全秩序的塑造将越来越依靠中国。

第二，当今日美同盟所要针对的最大目标就是所谓“中国威胁”，特别是由于地理接近，日本对中国崛起和中国军力增强更加敏感，而缓和中日关系可起到削弱“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弱化日美同盟的纽带即同盟所要针对的“假想敌”，从而减轻日美同盟对我们的压力。当然，我们要促使中日关系保持缓和以削弱“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必然意味着与为了修宪而极力煽动“中国威胁论”的安倍政府之间开展一场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

第三，作为同盟国，日本和美国都对对方与中国“套近乎”高度敏感和猜忌。从美国方面看，阻止日本走近中国是长期战略，不愿看到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史以及邦交正常化以来近30年友好外交历程的日本与中国重拾两

^① 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是进攻性的，是有备而来的。2008年5月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大地震，美国国际救灾队进入了四川省的很多村庄和深山，一方面是为了救灾，一方面对四川省的核武器研发、生产和储存基地进行了彻底的地面调查，并结合卫星摄影掌握的情报，精确地获取了位于四川的铀浓缩工厂、核弹头工厂以及核武器储存基地的位置，其后美国在冲绳分阶段地配备鱼鹰飞机（总数达到24架），就是准备在与中国发生冲突时，利用已经获取的情报和可以无需着陆往返于冲绳与四川之间的鱼鹰战机组来迅速控制成都军区的核武器实施。又比如，近来美国派遣航空母舰奔赴西太平洋，就显示出美国对南海危机迫在眉睫的预判，因为如果等到与中国发生冲突时再派遣航母，则需要几个月的准备时间。

^② 转引自《日本如果不想打仗，就别装得在所不惜》，《环球时报》2016年12月11日。

国人民之间感情的力量。^① 从日本方面看, 至今日本还对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搞“越顶外交”耿耿于怀, 担忧与中国存在着近百个战略与经济对话渠道的美国再次搞“越顶外交”把日本边缘化, 担心美国对日本的核保护力削弱等。因此, 改善中国对日关系或对美关系或同时改善中国的对日对美关系, 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日美之间的相互猜忌和相互不满, 分化或弱化日美同盟剑指中国的锋芒。

第四, 美日同盟不是铁板一块, 两国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利益”, 前者构成两国同盟关系的纽带, 后者则构成两国相互矛盾的原因。中日两国也不是完全的“对头”, 两国既有“不同利益”也有“共同利益”, 前者构成两国相互矛盾的原因, 后者则是两国相互合作的基础。中国可能以经济、军事实力相逼, 促使日本弱化乃至放弃在对外政策上的对抗性质, 回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贸为主的正常中日关系来。

2016 年 12 月安倍晋三首相不顾奥巴马总统的反对, 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东京, 在美欧加码制裁俄罗斯的大背景下, 日俄居然就启动在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共同经济活动达成一致。同月, 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起草和力推对南苏丹实行武器禁运等制裁的议案, 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因为担心在当地维和的自卫队员的生命安全而投了关键的弃权票, 致使该议案未获通过。这又一次反映了日美的“不同利益”引起两国外交政策矛盾, 已经发展到了日本敢于显示“个性”向美国说“不”的地步。

第五, 美国对日“军事占领”是当今日美矛盾的一个焦点。目前美军分布在日本国内的基地共计 130 个, 其中八个位于东京都, 根据美军基地的要求, 日本民用飞机必须避开包括东京都西部上空在内、横跨一都八县的巨大空域绕道飞行。一个“独立”和成熟国家的首都居然要仰赖美军“保护”, 不能不说是民族尊严的极大伤害。与此同时, 驻日美军士兵频频滋事, 作奸犯科, 引起日本公众的极大不满和愤慨。^② 不少日本学者认为, 日本虽然表面上保持着独立国家的门面, 实质上仍被美国占领, 每年为美军占领支付约

^① 2016 年 9 月 5 日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安倍晋三首相在杭州举行新闻发布会时, 引用中国古代诗人苏轼的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说“真的东西无论怎样都会发出光泽”, “2004 年杭州与岩国市(安信的故乡)签署了锦带桥友好交流协议书”, “这说明日中间的草根自古以来就有交流”。参见《日本首相安倍答澎湃: 中日民间交往自古有之》, 搜狐网, 2016 年 9 月 6 日, <http://3g.k.sohu.com/t/n157134020?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2016-12-01]。

^② 2016 年 12 月美国将冲绳“北部训练场”的一部分、占地约 40 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给日本, 但这块地仅占驻日美军基地占地面积的 1/25, 对缓和日美围绕美军基地问题矛盾的作用可以说微乎其微。

80 亿美元巨额费用，对方还不满意，而日本忍受“被外国占领”和不平等的日美同盟关系的最大理由是为了对付“中国威胁”。^①

另一方面，美国坚持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其实也有对曾经疯狂地发动战争的日本加以防范的一面。当然，目前美国坚持对日军事占领和日本“情愿”接受“占领”，主要是为了防范中国。因此，通过缓和中日关系来削弱“中国威胁论”的影响，有助于弱化美国对日本军事占领的必要性，有可能对日本民间反对美军基地运动起到间接的支持作用，扩大日美在基地问题上的矛盾。

第六，从日本的国情看，日本是一个“高度对外依赖国家”，这是它的一大软肋。日本 73% 的谷物、99.7% 的石油、96% 的天然气、97% 的煤炭、100% 的铁矿石都依赖进口，无论日本从世界上哪个国家或地区进口谷物、能源或矿产，关乎日本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海上运输线的“最后一海里”必然位于日本周边海域。换句话说，日本粮食安全保障、能源安全保障、资源安全保障等各种生存条件，都可能因为在周边海域与邻国擦枪走火乃至爆发战争而丧失殆尽，这是日本不愿看到中日紧张关系升温直至发生战事的又一个真实原因。此外，日本在 2020 年将举办东京奥运会，如果中日关系不是保持缓和而是日趋紧张，可能影响东京奥运会的顺利举行。

其实，鼓吹“中国威胁”、升温中日紧张、开展军备竞赛仅仅是日本右翼的国内政治需要，完全违背了日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现在日本背负着与 GDP 之比高达 249.34% 的政府债务（在全世界 184 个国家和地区中居首位）^②，可增加用于军备竞赛的财政余地十分有限。如果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下去，日本财政乃至整个日本经济越来越可能被军备竞赛拖垮。再者，日本要增强军备也只能在美国限定的范围之内进行，比如美国不会允许一个曾与美军在太平洋展开过世界战争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航母编队交战的日本重新建造大型航母，更不用说发展战略性核武器了。

第七，从中日关系看，两国地理接近，在经贸、民间交流、地区合作和非传统安全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共同利益，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已开展了九轮谈判，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已举行了 18 次，东亚一体化进程仍在继续前行；美国如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有可能促使日本“回归亚洲”。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双

① 增田俊男『日本大復活』、PHP 研究所、2006 年。小川和久『日本の戦争力』、アスコム社、2005 年。

② 「日本の政府債務残高の推移 世界経済のネタ帳」、http://ecodb.net/ranking/imf_ggxwdg_ngdp.html [2016-12-01]。

方可以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提高各领域务实合作水平，弘扬民间友好传统，推进地方交流。双方应该按照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共同推进区域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 2014 年底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为基础，中日关系延续习近平主席于 2014 年 11 月底开启的缓和进程未必不可期待，中日还需要“把握 2017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201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40 周年等重要契机，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①当然，缓和与改善中日关系的必要条件是日本不再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在南海问题上谨言慎行，避免对中日关系改善造成干扰。

第八，美日正在策划和编织美日澳、美日菲、美日越、美日印乃至美日台等对华围堵圈片段，在每个片段中日本都是关键角色。如果中国能争取日本不对中国采取对抗立场，维持 2014 年 11 月底以来的中日关系缓和局面，则有助于弱化与分化这一连串正在形成的对华围堵圈片段，防止这些片段连接成完整的对华围堵圈。而且，“中国显然没有同时与美国、日本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激烈对抗的意愿，那样做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②。为此，一个可能的战略选择，就是依据国家的实力来界定核心利益的不同级别和战略目标的优先顺序，在南海地区争端升温的背景下，促使东海地区争端趋于缓和，以防止南海、台海、东海“三海同时升温”，防止南面与东面两个方向同时受“敌”，避免再次陷入 20 世纪 60 年代“两个拳头打人”的境地，努力分化和减少国际上遏制中国崛起的力量。

比较国际政治地壳变动的内力分布，在 2017—2020 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大到小依次是：朝鲜、台海、南海、钓鱼岛周边。这是笔者在参照国内外各方面预测的基础上做出的排列。如果中日两国利用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40 周年等重要契机实现领导人互访，增加两国间最欠缺的东西——政治互信，中日关系继续缓和并改善的可能性很大，中日关系“进大于退”的现实性将与日俱增。

三、对日“区分开来”原则的新内涵

王毅说“我们当然希望中日关系能够真正地好起来。但是俗话说‘治病

^①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人民网，2016 年 9 月 6 日。

^② 《日本威胁用导弹封锁宫古海峡不可接受》，《环球时报》2016 年 8 月 15 日。

要断根’，对中日关系而言，病根就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面对中国的发展，究竟是把中国当作朋友还是敌人？当作伙伴还是对手？日方应该认真想好这个问题，想透这个问题。”^① 围绕这个问题，中国仍然需要坚持一分为二看日本，把日本当政者的道路选择和对华认知与广大日本人民的道路选择和对华认知区分开来。对于日本当政者而言，他们选择的道路就是使日本成为“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他们的对华认知显然是认为强大中国是阻碍他们实现“强大日本”的竞争对手，因此必须联合美国加以牵制。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当政者对中国的敌视日益增长，需要加以密切关注和警惕。当今日本已进入“超老龄社会”和“人口减少社会”，社会活力大不如前，而且背负着相当于GDP两倍半的公共债务，战后得以从冷战格局中获取最大实惠的历史机遇亦不复存在，这样一个“其实只有中小国家的‘命’”的日本的领导人居然还在做“强大大国梦”，还要成为“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与中国“有一拼”，显然既脱离了日本的基本国情，又背离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特别是日本当政者没有认识到日本“大国梦”的真正制约在于日本自身的条件与国情，在于其错误的对外政策，却把怨气撒到中国头上，实在是太缺乏自知之明。

在民间层面上，从包括大量青年学生在内的、超过半数的日本民众强烈反对所谓“新安法”的事实看，广大日本民众的道路选择显然倾向于反对战争，坚持和平发展。但是受日本政府和媒体等的影响，日本广大民众的对华认知体现为“四感交集”：（1）对中国GDP超日一时不能适应，产生“失落感”；（2）对中国军事力量迅速发展抱有“恐惧感”；（3）对中国现代化水平落后于日本存在“优越感”；（4）日本民族固有的强烈危机感。这“四感交集”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持好感的人数占比跌至中日复交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与此同时认为两国关系“重要”的日本人的比例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七八十的高位。2014年8月日本广播协会民调显示，认为有必要尽快举行日中首脑会谈的受调查者达55%，说明大多数日本民众担心两国关系走向对抗和战争，希望日中双方采取稳健的外交政策，而且首先将这种希望寄托在两国领导人的对话上。

从中国方面看，对于日本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拙劣表现以及安倍推行“俯瞰地球仪外交”牵制中国的所作所为，当然要针锋相对地进行不懈斗争，与此同时，在战略层面上，中国首先需要做好自己的事，解决好自己的内部

^① 《王毅：中日关系病根就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新华网，2016年3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08/c_128782862.htm [2016-12-10]。

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我们“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①

我们要继续加强自己的综合国力，努力提高现代化文明水平，在国际变局中理性认识自身能力和影响力，真正成为既先进又强大的国家。笔者曾撰文提出，如果中国经济超日本十倍，同时把基尼系数降下来（2008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0.49，同年日本的基尼系数为 0.32），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平等和谐的中国，就能彻底打掉日本对中国的“优越感”，令日本对中国真正“服气”，进而影响到政府的对华政策，中日间很多问题就比较办好。^② 2016 年中国名义 GDP 已经达到日本的 2.58 倍^③，要实现“经济超日本十倍”和现代化目标应该不会再用很多年，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战略耐心，既与日本右翼的错误政策和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又努力维护中国经济建设所必需的稳定周边环境，将中国建成为既实力强大又文明和谐的国家，中日关系才可能真正太平，中国对日本道路选择的影响力将可能越来越大。巴里·布赞说“中国看上去跟日本关系不好。但不管中国喜欢与否，日本依旧是一大势力。如果中国能够同日本建立起不是友谊、而是稳定的妥善关系，那将会大大削弱美国的地位。但只要日本认为中国是威胁，日本还将与美国保持联盟关系，其他的任何举动都是不明智的。”^④

最后，让我们重温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话“中日和平、友好、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希望日本同中国一道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⑤ 可以相信，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和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引下，随着中国的现代化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拉大对日本的领先差距，从中长期看，中日关系“进大于退”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集体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3 年 5 月 24 日，http://www.gov.cn/lhdh/2013-05/24/content_2410799.htm [2016-12-20]。

② 参见冯昭奎《经济超日本 10 倍，中日才太平》，《环球时报》2013 年 2 月 8 日。

③ 「名目 GDP (USドル) の推移 (1980—2016 年)」，http://ecodb.net/exec/trans_country.php?d=NGDPD&c1=JP&c2=US&c3=CN [2016-12-20]。

④ 《专访巴里·布赞（上）寻求假想敌，美国鹰派渴望中国崛起》，凤凰网。

⑤ 《习近平主席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2015 年 5 月 24 日。《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人民网，2015 年 4 月 23 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5-04/23/content_1557234.htm [2016-11-30]。

**The “Advance” and “Retreat”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The Prospect of Predic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Dichotomy”**

Feng Zhaokui

The principle of “dichotomy” is an important thought of China’s policy toward Japan.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in 1972 is regarded as a major diplomatic achiev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dichotomy” principle. Since the end of 1970s, Sino – Japanese friendly relations have made considerable progress. In September 2012,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Diaoyu Islands by Japanese government led to growing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November 2014, President Xi Jinping met with prime minister Abe at APEC summit meeting, marking the relaxation of the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At present, the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are still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like a boat rowing upstream, with two scenarios in the future. On one hand, the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may remain in tension featuring “greater backward than progr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may also continue to relax featuring “greater progress than backward”. In the long te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diplomatic thought of “the huma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by President Xi, there may be a growing trend of “greater progress than backward”, meaning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中日関係の「進」と「退」

— 「二分法」という原則に基づく予測の展望 —

冯 昭奎

少数の軍国主義者と大多数の日本国民を厳格に区分する「二分法」は、対日政策の重要な思想である。1972年の中日国交正常化は、中国が「二分法」の原則を堅持したことによる重要な外交成果である。1970年代終盤の改革開放以来、中日友好関係は著しい進展を遂げた。2012年9月、日本政府による「釣魚島買い取り」騒動のおかげで、釣魚島の主権をめぐる両国の紛争は急激に悪化した。2014年11月、習近平主席は安倍晋三首相と会見し、中日関係改善の一步を踏み出した。現在、日中関係は依然として困難に直面しており、逆流を行く舟の如く、進まなければ押し戻されてしまうといった状況にある。今後の日中関係の発展には二つの可能性がある。(1) 中日関係は「前進せず後退」し、両国関係は緊張状態が継続する。(2) 中日関係は「後退せず前進」し、緩和する傾向で維持される。中長期的に見て、習近平主席が提唱する「人類運命共同体の構築」を核とした外交戦略思想の下、中日関係は「後退せず前進」の可能性が日増しに高まると予想される。

(责任编辑: 叶琳)